



关于中药“辛润”理论的探讨

“辛润”为中药五味理论中一个有所争论和难以理解的问题。“辛润”之说，出于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，原文曰：“肾苦燥，急食辛以润之，开腠理，致津液，通气也。”辛味药润何种燥证？辛润的代表药物是何药？辛味何以有润的作用？历来说法不一。

一是把“辛润”说成既能润肾燥，也能润其他燥证，如肠燥等。把润的作用看成是辛味本身所具备的作用。如明代缪希雍对当归与菟丝子的功效解释，《本草经疏》当归条曰：“当归辛大温无毒，甘以缓之，辛以散之润之，温以通之畅之。”菟丝子条曰：“五味之中，惟辛通四气，复兼四味，《经》曰肾苦燥，急食辛以润之，菟丝子之属是也。”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柏子仁条中 also 说：“柏子仁，性平而不寒不燥，味甘而补，辛而能润。”他们把当归、柏子仁的润肠作用，菟丝子的滋肾润燥作用，看成是辛味所致。在高等院校《中药学》的二版、四版教材中，亦把菟丝子作为辛润的代表药，讲辛有“润养”作用。然而上述所列三药，虽然具有润燥作用，但它们的润燥作用，是取决于这些药本身质润，含有油脂，而不是由于辛味所致。

二是把“辛润”说成具有滋阴降火治疗肾阴虚相火偏旺的知母、黄柏之类。如张洁古《六腑五脏用药气味补泻》：“肾苦燥，急食辛以润之，黄柏、知母。”在《中药学》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中，亦秉此说，把知母作为辛润的代表药之一。然黄柏苦寒，知母苦甘寒，均无辛味，历代亦未见有辛味的记载。此二药黄柏苦燥，知母虽能滋阴润燥，亦是因其质润所致。故张氏以此作辛润治肾燥的代表药是错误的。

那末，“辛润”之说的原意是什么呢？辛润不能与辛散、辛开、辛行相提并论，它不同于辛散、辛开、辛行那样，指出了辛味药有发散及开闭行气的作用，具有较普遍的指导意义。因为辛味药绝大多数是偏于燥的，本身并无“润”的作用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所说的“肾苦燥，急食辛以润之”是对肾气不化，气不化津，津液不能输布所致的燥证的一种特殊治法。经文本身就已作了解释：“开腠理，致津液，通气也。”张景

岳的《类经》对此作了精辟的注释：“肾为水脏，藏精者也，阴病者苦燥，故宜食辛以润之。盖其能开腠理致津液者，以辛能通气也。水中有真气，唯辛能达之，气至水亦至，故可以润肾之燥。”后世医家，不究经文的真义，把辛润作为辛味药本身所具有的作用之一，因此造成了混乱和费解。

以辛味药治肾燥的代表药应该是什么呢？我认为当以肉桂、细辛之类为是。成无己曰：“水停心下不行，则肾气燥，宜辛以润之，细辛以行水气而润燥。”李时珍也说：“（细辛）辛能润燥，故通少阴及耳窍，便涩者宜用之。”《别录》谓细辛能“通精气”。王好古亦曰：“（细辛）润肝燥，治督脉为病，背强而厥。”至于肉桂，《别录》曰：“坚筋骨，通血脉，理疏不足，宣导百药无所畏。”李时珍曰：“肉桂下行，益火之原，此东垣所谓肾苦燥，急食辛以润之，开腠理，致津液，通其气者也。”肉桂、细辛味辛而入肾，能促进肾之气化而达到化生和输布津液、治疗肾燥之证的效果。

综上所述，“辛润”之说是特殊病证的一种治法。这种治法在临床上是有其实用价值的。对肾阴虚燥证，一般情况下用甘寒、咸寒滋阴补阴之品，如熟地、玄参、龟板等能起到治疗效果。但有时往往数投滋阴补肾而罔效，尤其是一些邪水内停，而真阴亏虚，口干咽燥，舌光少苔之证，在补肾养阴药中投入细辛、肉桂之类，辛开通气，肾之气化来复，津液得以化生而上承，口干咽燥得除，邪水得利，尿少便涩也随之解除。此法用之得当，确有常法所不可比拟之效。

南京中医学院 陈松育

正“腠”之义

腠理，是由两个意义不尽相同的名词组成的一个复合名词。张仲景在《金匱要略·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》中对腠理分别下了这样的定义：“腠者，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，为血气所注；理者，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。”由于仲景只论述了“腠”所具有的内涵，没有说明“腠”的具体所指，故历代医家多以腠理并称，认为二者同指一物。现行的辞书和中医书籍中也沿袭了这种观点，认为腠理是“泛指皮肤、肌肉、脏腑的纹理及

皮肤、肌肉间隙交接处的结缔组织”。(《中医大辞典·基础理论分册》第 321 页)笔者认为其解欠妥, 不尽全面, 确切地说, 它只是“腠理”中“理”的概念, 至于腠, 应该是人体体表的玄府, 即汗孔。略述理由如下:

1. 腠理一词, 首见于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, 曰“清阳发腠理”, 即指人体卫阳之气散发于汗孔及皮肤肌肉组织间隙。何以见得?《素问·调经论》云:“上焦不通利……玄府不通, 卫气不得泄越, 故外热。”上述两条经文, 一言生理, 一言病理, 表明卫阳熏蒸于体表组织之间, 而腠理位置恰恰在人体之表, 故常作为体表的一个代名词。若玄府通畅, 腠理开阖正常, 则卫阳运行于体表, 起着卫外作用。反之, 卫阳不得泄越, 故郁而发热。于此可见, 腠之闭塞就是玄府不通, 腠即玄府。

2. 仲景谓腠是“三焦通会元真之处, 为血气所注”。这里所述的三焦, 当是部位概念, 即人体上、中、下三部分, 亦泛指整个人体; 元真者, 真阴也, 汗液出自于内, 源于真阴。汗的本质, “在内为血, 在外为汗”(《丹溪心法》), “以阳气为运用, 以阴精为材料”。(《温病条辨》)。因此, 汗液乃“血气所注”, 阳加于阴。人体体内的阴液, 在阳气的蒸腾气化作用下变为汗液, 注之于腠而后排出体外。既然腠是由真阴气化而产生的汗液在体表的所注之处, 那末腠为玄府则毋庸置疑了。

由此可见, 腠与玄府、汗孔, 乃同物异名。

江西中医学院 刘晓庄 张跃荣

《灵枢·热病》篇首错简 说之质疑

《灵枢·热病》篇为热病之专论, 却以偏枯与痿之证治开篇, 似与全篇内容无关, 因此刘衡如先生认为:“本段在此, 文义不属, 昔已有人致疑, 《甲乙》卷十二下, 移上《癫狂》篇‘骨清取并经也’之后。《太素》卷二十五列此于《热病说》中, 恐错简已在杨氏之前矣。”《灵枢经校释》亦认为“其意费解, 疑有错简”。纵观历代名家注释, 既未提出疑问又无恰当解释, 多随文衍义而已。通过进一步学习《内经》, 参考历代有关论述, 反复考证推敲, 余认为错简之说似有不妥, 并不揣肤浅试述如下。

偏枯与痿均为古病名, 根据本篇所描述的症状, 颇似后世中风, 《内经》认为其病因主要为外风, 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, 唐宋以前中风之因多以“内虚邪中”立论, 至金元以后才突出“内风”说。《内经》中热病包括的范围很广, 究其病因, 从《内经》其他热病

专篇的论述来看, 均以风热寒等外邪为主。偏枯与痿均为外风所致, 而热病之因亦由外邪, 因此其发病及病变特点具有某些方面的一致性, 在治疗上也应有其共同遵循的原则。本篇开篇即论偏枯与痿之别, 对于引出热病的治则有很重要的意义。偏枯与痿均以肢体瘫痪不用为特征, 但偏枯病位较浅而痿之病位较深, 偏枯病证轻而痿较重, 二病有病位浅深症状轻重之异, 治疗也应有别。热病亦由外邪所致, 外邪伤人由表及里, 热病之初邪在经络, 当取其表疏泄邪气, 不可病浅治深引邪入内; 热病中后期邪已入里正气已伤, 则不可徒治其表, 大凡热病中后期均有热邪伤阴之象, 治疗要顾及阴津的存亡。故本篇论述偏枯与痿, 非唯论二病而设, 其目的在于论述热病之治, 通过二病之鉴别说明其不同时期不同治疗的机理, 提示了辨证论治的重要性。可见, 《热病》篇首与全篇内容一脉相承逻辑严谨, 并非赘文。

类似本篇的写作手法, 《内经》中并不少见, 如《灵枢·癫狂》篇为癫狂病专论, 而开篇却介绍目内眦、目外眦的概念。张介宾从望神的角度将此内容与癫狂诊治联系起来, 使全篇内容一致, 用理校法解决了表象之文意不属。可见, 隐喻是《内经》的写作手法之一。

《甲乙经》历来被作为校释《内经》的重要依据之一, 但它把《内经》及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》的内容“事类相从”, 完全打乱了原书的篇章及排列顺序。《热病》篇首的内容被《甲乙经》归入《阳受病发风第二下》篇章中, 其上承《灵枢·癫狂》之风逆证治, 下接《素问·长刺节论》大风之刺, 同时也与《内经》其它有关风病论述为邻, 把有关内容汇集一处而系统论述阳分受邪发风病的一系列问题。如果据此将《热病》篇首归入《癫狂》篇, 如又无其它旁证, 实难令人置信。

综上所述, 《内经》时代认为偏枯与痿为外风所致, 热病成因亦由外邪, 通过对偏枯、痿二病的分析, 说明热病不同时期的不同治则也是《内经》常用的写作手法。

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 于璟玲

“身体尪羸, 脚肿如脱”新释

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中风历节病篇有:“诸肢节疼痛, 身体尪羸(一作尪羸), 脚肿如脱, 头眩短气, 温温欲吐, 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。”对其中的“身体尪羸, 脚肿如脱”两句, 历代医家多认为是指身体瘦弱, 内脚